



一、導論：當公共責任離地而不離心

自2020

年香港《國家安全法》正式實施以來，香港的政治與社會生態發生了劇烈的轉變。曾經蓬勃發展

的公民社會平台，無論是政黨、媒體、工會抑或各類社會組織，均面臨前所未有的壓力與打擊。在強大的制度性壓制下，這些組織紛紛解散或轉型，香港公民社會彷彿陷入一場「全面解組」的困境。這不僅是單一組織的消亡，而是一個廣泛而深刻的制度性斷裂，使得香港作為一個多元公共空間的生態系統遭到破壞，市民參與公共事務的渠道被大幅封閉。

面對這樣的政治現實，不少香港人選擇了流亡或離散。這種地理上的遷徙不僅是為了逃避迫害，更是一種政治與倫理的抉擇。流亡者並非簡單地與香港社會斷絕連結，反而在新的環境中嘗試重新構建自我作為公共行動者的身份與平台。從表面看來，離開故土似乎是對抗爭的放棄，然而，流亡港人卻以不同的方式，持續參與香港的公共議題，努力讓香港的民主訴求在國際舞台上得以延續。這種「離地不離心」的公共責任感，成為理解當代香港政治變遷的關鍵視角之一。

本文的研究核心即在於探討這些流亡港人如何在海外重構自身的公共行動者身份，以及他們如何創造新的公共平台與抗爭模式。過去香港的公共動員，多倚賴本地的組織架構與實體空間，如遊行、集會等形式。但在國安法的高壓下，這些傳統渠道受到嚴重限制，流亡者必須透過數位媒體、國際連結及跨國組織的形式，尋求新的抗爭策略與社會參與方式。他們不再是孤立的個體，而是透過跨境網絡連結形成新的公民社會生態，這種轉型值得深入探究。

為避免流於對流亡港人的悲情描述或抒情敘事，本文特別採用行動者中心與制度轉化的分析框架。筆者將聚焦於流亡者的實際行動策略、組織建構及其面對的挑戰，試圖理解在壓迫與限制下，香港公民社會如何透過新的制度性空間持續運作。這種視角同時關注個體行動與結構條件，強調制度與文化的互動關係。

例如，前中西區區議員葉錦龍參與推動「日本香港民主連盟」，不僅為受壓迫的香港人發聲，還透過文化交流及藝術創作，嘗試引起國際社會對香港局勢的共鳴。這種行動不僅是政治抗爭，更是一種跨文化的公共參與，展示了流亡港人如何在海外再造公共空間。此外，海外離散港人亦發起如「香港議會」(Hong Kong

Parliament

)等倡議，嘗試以網絡平台維繫香港的象徵性代表制度，反映出離散社群在制度崩解後的持續努力。

本文將通過這些具體個案，以及相關文獻與媒體報導，分析流亡港人在政治壓迫下如何重塑公民身份，並在新的環境中延續民主抗爭的精神與行動。這不僅是一場政治抵抗，更是公共責任的延續與重塑。

總體而言，香港公民社會的制度崩塌，是一場政治生態的大震盪，但流亡者的行動證明，公共責任並未隨著地理位置而消散。離地不離心，這種精神將成為香港未來民主與自由運動持續前行的重要力量。透過理解這一過程，我們不僅能更清晰地看見香港政治轉型的現實，也能洞察在極權壓制下，公民社會如何在全球化的時代背景中尋找新的生命力與可能性。

二、葉錦龍：在日本重新打開公共行動的門

A. 身分轉變：

從區議員到跨境倡議者

流亡對葉錦龍而言，不僅是身體上的遷移，更是一種心理與政治身份的轉折。從一位地方政治的參與者，轉變成為離散港人社群的協作者，再到如今跨國政治倡議者，他的角色變得更加複雜且具挑戰性。在日本這個他新的生活與工作基地，葉錦龍既保持對香港的強烈連結，也意識到自身行動需跳脫本地框架，尋求與國際社會的共鳴與合作。

這種身份的重塑體現了流亡者必須在新環境中重新找到公共參與的語言與形式，既不失去對故鄉的責任感，也需適應海外多元文化與政治結構，成為跨境連結的橋樑。葉錦龍的經驗，正是當代港人面對壓迫如何持續發聲與行動的代表案例。

2023 年 7 月 20

日，葉錦龍於日本外國特派員協會（FCCJ）召開記者會，正式宣布成立「日本香港民主連盟」（Japan Hong Kong Democracy Alliance, JHKDA）。作為曾任中西區區議員及2020年至2021年期間民間人權陣線（民陣）副召集人的資深政治行動者，葉錦龍將該組織定位為連結亞洲區內同樣遭受壓迫人民的平台，不僅是為流亡港人發聲，更致力於跨文化交流與跨議題聯動。

「日本香港民主連盟」的行動策略涵蓋多方面。組織自成立以來，持續關注港府《國安法》的域外延伸執法，並聯同「Lady Liberty HK 香港民主女神」向聯合國人權理事會提交關於中國及香港人權狀況的民間監察報告，試圖透過客觀事實向國際社會揭露人權侵害行為，並藉此形成國際壓力。此外，連盟亦透過文化交流及藝術創作，以多元、跨語言的方式，讓香港人的抗爭經歷引起更多國家的共鳴。葉錦龍曾於記者會上引述李小龍名言「To hell with circumstances; I create opportunities」，強調在極權壓迫下，流亡者必須主動創造空間與機會，持續為受壓迫的港人發聲、為民主播種。

C. 離散港人代議制度的象徵性倡議

在香港本地政治空間被摧毀、傳統的公民代表制度瓦解後，象徵性的政治表達空間急劇萎縮。許多海外離散港人意識到，必須以新的形式重建這些代表性象徵，維持公民社會的政治討論與連結。

因此，海外社群陸續出現了如「香港議會」（Hong Kong Parliament

）與「影子議會」等籌組倡議。這些倡議嘗試透過網絡機制與海外投票，複製並重建香港民間的代議機制。雖然這些組織現階段不具備實體議會的法定地位，亦面臨合法性及代表性的內部辯論，但其存在意義在於保持香港公共空間的象徵性與制度記憶，凝聚離散社群的政治意志。

通過這類制度象徵的重建探討，流亡者不僅討論香港當前的政治情況，也對外界展示香港民間社會依然存在且未曾放棄的抗爭精神。數位平台與海外實體連結的運用突破了地域限制，使得散居各地的港人得以共同參與，這不只是形式上的模仿，而是對抗國安法壓迫下政治空間瓦解的積極回應。

三、知識與真相的堅持：鍾劍華、黃偉國與教育平台的興起

在香港政治環境急劇收緊，公民社會空間日益萎縮的當下，知識分子如何在流亡與離散中尋找新的公共角色，成為本研究的重要關注點。鍾劍華博士與黃偉國博士，兩位在香港具有重要學術與評論影響力的人士，便是這一轉型的代表。透過成立教育平台和民意研究計劃，他們不僅延續了對真相的堅持，也嘗試重建因政治壓迫而瓦解的公共論述空間。

A. 知識人如何轉化角色

鍾劍華，曾任香港民意研究所副行政總裁，是香港民主研究和公共意見調查的重要學者之一。隨著國安法的實施，他不得不離開香港，移居英國，並成為港府通緝對象。儘管身處海外，鍾博士並未放棄對香港社會的監察和研究，而是轉型為海外公共評論與民意研究的核心人物。他的行動不僅是對香港政治環境的回應，更是一種知識人的責任感的體現：即使身在他鄉，依然保持對真相與民主理想的忠誠。

與此同時，黃偉國博士作為政治評論者，也從單純的輿論觀察者轉變為主動參與者，投入到教育

行動中。他積極參與內容創作，與鍾劍華及其他學者共同致力於構建支持民主教育的多元平台，服務離散港人及下一代。黃博士強調，教育是維繫香港人身份認同和民主價值的關鍵，尤其是在本地教育資源被逐漸限制的當下。

B. 成立「時代公民教育平台」（Citizens of Our Time Learning Hub，簡稱 COOTL）

面對香港公民社會的斷裂，鍾劍華、黃偉國與楊穎宇博士於海外聯手成立了「時代公民教育平台」（COOTL）。該平台的核心宗旨在於「留住真相、凝聚離散港人、教育未來一代」。他們認為，真相與知識的保存是抗衡歷史抹殺與洗腦的關鍵，透過教育傳遞民主理念，將成為香港未來重建的基石。

COOTL

的內容涵蓋多個層面，包括歷史回顧、公民身份、法治理念、社會運動等六大類別。平台特別針對海外港人子

弟、教師以及民主評論人，

設計了不同的教育策略和資源配套。透過YouTube

頻道，平台發布了大量教育影片及評論文章，形成一個集民主教育與反洗腦為一體的網絡空間。

這種結合視覺與文字的媒介策略，有效地擴大了受眾範圍，尤其吸引了年輕一代。

黃偉國指出，COOTL

不僅是教育工具，更是一種公共記憶的守護者，防止香港的民主歷史被遺忘或扭曲。他表示：「我們希望讓下一代能清楚地知道，香港曾經有過怎樣的抗爭與民主理想，這是他們應有的權利和

責任。」

C. 「香港民意及政策研究網絡」的成立與意義

2024年4月下旬，由鍾劍華與海外學者共同發起成立的「香港民意及政策研究網絡」（Hong Kong Public Opinion and Policy Research Network, HKPOPRN

）正式對外宣布。該網絡的目標是彌補香港民主制度崩壞後產生的「民意空缺」，通過獨立的民意調查與研究，反映港人的真實態度與社會關切。

該網絡的參與成員涵蓋了社會學與政治學界的學者，其中部分人士基於政治安全考量而以匿名方式參與，這深刻體現了在政治高壓下海外學術研究的韌性與包容性。

「香港民意及政策研究網絡」的研究範圍涵蓋身份認同、法治、自由、社會政策等，力圖全面反映香港社會多元的聲音與期待。鍾劍華明確強調，該計劃保持其獨立性與客觀性。他表示：「我們歡迎不同政治立場的參與，研究議題不應被侷限，包括『大國崛起』、『東升西降』、『由治及興』等，都在考慮範圍之內。」

然而，在相關研究宣布成立的前後，港警多次拘捕與鍾劍華有聯繫的家人及前同事，明顯形成政治威嚇。面對此情況，鍾博士呼籲港府應有胸襟正視民意：「有為、有擔當的政府，應明白民意不管如何處理，均會客觀存在，有能力的政府不單要有能力面向民意，亦要能應對民意。」這番話不僅是對政治高壓環境的警醒，也表達了知識人對學術客觀的堅持。

小結：破碎中的縫合

在國安法及政治高壓下，香港的民主制度與公民社會遭受嚴重破壞，公共空間幾乎蕩然無存。鍾劍華與黃偉國等知識分子，透過成立教育平台與民意研究計劃，積極為香港社會延續真相與民主意識的傳承。他們的努力不僅是個人身份的轉化，更是對制度性斷裂的回應和補充。這些平台和計劃，象徵著香港離散者對公共責任的堅持，嘗試在碎片化的全球流散社群中重構政治話語與集體記憶。

四、工人運動的跨境重建：香港勞權監察

香港工運歷經多年風風雨雨，尤其在2019年反送中運動及2020

年國安法實施後，遭遇嚴重打擊。多個工會組織被迫解散，領袖人物被捕或流亡，傳統的工運空間與組織架構面臨瓦解。這種制度性壓迫導致工人運動不僅失去本土運作的平台，更面臨能見度與政治影響力的大幅流失。面對這樣的困境，香港工運領袖蒙兆達等人在海外重組，創立了「香港勞權監察」（Hong Kong Labour Rights Monitor

）組織，試圖透過跨境行動，維繫勞工權利議題在國際社會的能見度，並重建工運的制度價值與公共角色。

A. 組織背景與創辦人

香港職工盟作為本地最具影響力的工會聯盟，長期推動勞工權利與集體談判，扮演重要的社會運動角色。然而隨著國安法的推行，職工盟在2021年被迫解散，工運核心領袖紛紛面臨政治迫害。蒙兆達，作為前職工盟重要成員之一，因政治壓力及安全考量選擇離開香港，轉而在海外尋求新契機。

2022

年，蒙兆達與其他流亡及海外港人合作成立「香港勞權監察」，作為跨境工運的平台。此組織既是一種回應香港本土工運空間收縮的策略，也是維持勞工權益議題國際關注的關鍵渠道。蒙兆達強調，儘管工運受壓，但離地並不意味著放棄，反而是一場重組與新生的開始。

B. 關注議題與行動策略

香港勞權監察的核心使命是推動香港勞工的集體談判權利、組織自由及基本勞動權益的保障，並借助國際舞台持續發聲。組織積極發布各類政策報告與briefing文件，分析香港勞工政策與現況，向國際勞工組織（ILO）及其他跨國機構提交相關資料，期望能形成國際壓力，對香港政府施加監督。

其中一個重要工作是對抗極權政府在國際勞工組織中的影響力擴張，警示國際社會有關香港工人權利正遭受威脅，並倡導國際標準的堅持。除此之外，香港勞權監察亦積極聯繫亞洲其他受壓國家的工運組織，尋求跨議題、跨地區的合作。

C. 公民參與轉型的象徵

工會組織本質上不僅是勞工權益爭取的工具，更是民主教育與社會協作制度的細胞。它們培育了集體討論、民主決策與自我組織的能力。香港工運遭受嚴厲打擊的背後，實質上是整個公民社會中介機制與公共參與制度的瓦解。

「香港勞權監察」的成立展示了一種離地後的公民行動轉型。這不僅是權利爭取的延續，更是對「制度價值」的堅持與重構。蒙兆達曾公開表示：「即使身處異地，我們仍是香港工人的代表，仍肩負推動勞權進步的責任。工運不是簡單的權益抗爭，它承載著公民社會的民主根基，是制度價值的守護者。」這種堅持反映了香港公民社會流亡者群體中，普遍存在的制度保衛與文化記憶守護意識。

小結：不滅的工運火種

「香港勞權監察」作為海外新興工運組織的出現，不僅延續了勞工權益議題的國際曝光，也象徵著公民社會制度價值在逆境中不滅的生命力。蒙兆達與其團隊通過國際倡議、政策研究與跨地域合作，努力構建離散港人的公共參與新形態，為香港未來民主復興保留制度的可能。

五、散而不散：離散社群的新型公共空間

隨著國安法的實施與香港本土公民社會的全面收縮，許多活躍的抗爭者、組織成員以及普通市民選擇離開家園，成為離散的港人社群。這些離散者雖然離開了香港，但並未割捨對家鄉的關注與

責任，而是通過多元而靈活的公共空間，持續塑造屬於香港人的公民行動。這種「散而不散」的狀態，反映了在壓迫環境下公共空間的轉型與再造。

A. 離地與再根植：

海外港人社群的生成

離港後的港人並非完全流散，而是逐步在全球多個城市形成新的社群網絡。倫敦、東京、台北、多倫多等地成為離散港人的重要據點，各自發展出獨特的公共參與方式和行動策略。

在倫敦，港人社群與當地非政府組織（NGO

）積極合作，推動人權議題和香港民主運動的國際聲援。東京的港人則較為強調跨文化交流與在地連結。台北的離散港人則利用台灣作為民主典範，舉辦教育講座與展覽。在加拿大多倫多，港人社群活躍於當地華人社區與公民團體中。這些城市的港人社群雖分散於不同國家，但他們通過社交媒體、線上會議與協作平台緊密連結，形成一個跨境的公共網絡。

B. 公共空間的轉型

面對

香港傳統

公共空間被逐步封

鎖的現實，離散港人利用數字空間創

造出全新的公共領域。YouTube

頻道、播客節目、網絡

課程、線上文化展覽等成為新興的「公共廣場

」。YouTube

成為最重要的公共論壇之一，播客節目提供了深入的對話空間，網上課程和文化展覽突破地理限制，讓更多人理解香港的社會運動與歷史文化。透過這些數字平台，離散港人不僅重構了政治參與的場域，也為港人身分認同的保存與傳承創造了新的空間。

C. 風險與倫理困境

然而，新型公共空間的開展並非沒有挑戰。自我審查成為一種普遍現象，離散港人在言論自由與安全保障間尋找微妙平衡。內部分歧也是另一層困境，不同政治立場與行動策略導致社群內部存在裂痕。情感上的矛盾尤為深刻，離散港人常常背負對仍留在香港家人和朋友的安全牽掛。最後，「誰有權代表香港」的問題成為離散社群的倫理挑戰，這種質疑促使離散者反思自身定位，嘗試以多元合作、透明運作與開放對話，尋求被更廣泛港人認同的合法性基礎。

小結：抗逆的空間佈局

面對本土公共空間的萎縮，離散港人社群選擇在全球多地「再根植」，形成跨境連結的新型公共空間。雖然充滿風險與內部挑戰，但這種「散而不散」的狀態展示了流亡港人面對逆境時的韌性與創新。

六、數位邊界的坍塌：跨境監控與離散者的數位抗爭

隨著流亡港人社群在全球各地的「再根植」，《國安法》的影響力並未止步於香港邊境，而是透過數位威權（Digital Authoritarianism

）的擴張，實現了「域外執法」的常態化。對於離散港人而言，曾經被視為避風港的數位空間，已轉變為一個高度風險、被嚴密監視的戰場。

A.數位監控的延伸：從「實體控制」到「數位圍牆」

港府對海外離散社群的監控，已超越傳統的情報蒐集，轉向利用「數位威權」進行廣泛的認知作戰與資訊控制。透過社群媒體的輿情監測與數據挖掘（Data Mining

），執法部門能精準識別海外活躍抗爭者的身份、人際網絡及政治主張。更令人擔憂的是「心理威懾」的數位化：港警多次針對流亡者及其在港家屬進行拘捕與問話，並透過網絡公開宣傳這些行動，旨在製造一種「數字全景監控」（Digital Panopticon

）效應。流亡者雖然遠離故土，但在網絡空間中，他們仍能感受到來自香港的無形鎖鏈，即便是遠在日本、英國或加拿大的港人，在參與公開倡議或發表評論時，也必須隨時警惕「數位足跡」被追蹤的風險。

這種監控的複雜度在於其跨國界特性。港府利用「國家安全」作為藉口，向跨國科技平台提出內容刪除請求，或施壓要求提供用戶資訊。對於離散港人而言，這意味著其使用的

YouTube、Facebook、Telegram

或

Signal

等平台，潛藏著數據外洩的可能。當社交媒體演變為執法工具，離散港人的「安全邊界」已全面坍塌。

B. 跨境執法的常態化與自我審查的內化

數位威權的另一核心特徵是「認知上的自我審查」。由於港府屢次將海外發表的文章、影片定義為「煽動意圖」，離散者在進行公共倡議時，被迫時刻進行成本效益分析。他們必須在「揭露真相」與「避免連累留港家屬」之間做出痛苦的抉擇。這種自我審查並非自願，而是對數位威權恐懼的內化（Internalization of Fear）。

此外，數位監控還帶來了

「身份污名化」的風險。親官方的網絡水軍（Trolls）頻繁在海外論壇與社群媒體上對流亡港人進行集體霸凌與抹黑，將其貼上「亂港份子」或「外國代理人」的標籤。這種數位化的輿論攻擊，旨在削弱離散組織的公信力，並在潛在支持者心中播下懷疑的種子，從而破壞社群的凝聚力。

C. 離散社群的反制：從「防禦」到「去中心化」行動

面對監控與威嚇，離散社群並未束手就擒，而是演化出了一套獨特的「數位防禦體系」。首先是通訊上的去中心化。港人社群廣泛轉向使用高加密級別的通訊軟體（如Signal），並在籌備敏感活動時採用加密電郵（如ProtonMail）與去中心

化協作工具。這種對於

數位隱私的重視，已從個人層面擴展至組織運作的SOP（標準作業程序）。

其次是資訊的「去中心化傳播」。為了對抗港府的網絡封鎖，離散者開始建立冗餘的資訊備份系統。例如，將重要的抗爭紀錄、歷史檔案上傳至去中心化的儲存服務（如

IPFS），或運用VPN

與隧道技術，確保香港本地的受眾依然能獲取真相。這種「數位游擊戰」的特質，顯示了離散者已從單純的「言論輸出者」轉變為「資訊基礎設施的維護者」。

此外，離散社群開始進行「數位素養培訓」，透過定期舉辦安全工作坊，教導港人如何進行「數位清算」（Digital

Cleanup

），清除過往的敏感資訊，以及如何辨識釣魚網站與惡意軟體。這種集體防禦機制不僅提升了生存率，更在無形中強化了社群的共同意識：在數位威權的陰影下，保護彼此的隱私即是維護民主運動的根基。

小結：數位主權的覺醒

跨境監控與數位威權的延伸，強迫流亡港人必須重新思考「數位主權」。過去，大眾傾向於將數位空間視為公共資源；如今，離散港人深刻意識到，在極權數位擴張的背景下，數位空間必須是「被

主動維護

」的安全堡壘。這

種對於數位安全的堅持，本身就是一

種強而有力的政治行動——

它象徵著即便面對跨境的技術打壓，離散者依然拒絕被徹底噤聲，並持續在虛擬的數位邊界中，為香港的自由火種尋找生存空間。這不僅是技術上的反抗，更是在全球數位時代中，一場關於「真相權利」的長期保衛戰。

七、跨國社會連帶的具體機制：從「在地倡議」到「民主網絡化」

離散港人的跨境公民實踐，若僅止於社群內的連結與數位防禦，其政治影響力極易陷入自說自話的閉環。要實現真

正的「續命」與「影響」，流亡港人

必須將自身議題嵌合（Embedding

）至國際社會的既有政治框架中。這不僅是傳統意義上的「遊說」，而是一種深度的「跨國社會連帶」（Transnational Social Solidarity）機制。

A. 議題轉譯與戰略敘事：從「港人抗爭」到「全球威權主義」

離散港人之所以能成功連結異國公民社會，關鍵在於其「議題轉譯」的能力。他們將香港的民主運動從單純的「區域事務」，轉譯為全球「自由主義受威脅」的敘事基底。例如，「日本香港民主連盟」在與日本各界接觸時，刻意強調香港議題與日本國民安全、亞洲區域穩定的連結；在英國或加拿大，則聚焦於「共同價值」與「移民融入」之間的平衡。

這種戰略敘事成功打破了「外國干預」的刻板印象。流亡者透過與當地人權團體（如國際特赦組織、當地議會人權小組）合作，將香港的個案（如言論審查、政治犯處境）轉化為具體的政策倡議，例如推動《馬格尼茨基法案》（Magnitsky

Act

）的制裁機制，或促成各國針對香港事務的議會質詢。這種連結機制，使香港問題成為國際政客在面對「中國威脅」時，衡量其民主承諾的一把量尺。

B. 制度化連結：與當地智庫與非政府組織（NGO）的共生

跨國連帶的具體表現，在於離散組織與當地制度性力量的結合。在倫敦、華盛頓、東京等地，離散港人社群主動與當地的智庫（Think

Tanks

）建立緊密互動。這些智庫為港人提供了發表研究報告的平台，將流亡者第一手的調查數據（例如「香港民意及政策研究網絡」的研究成果）轉化為具政策建議性的文獻。

這種「智庫—

流亡者」的連結機制極具價值。它不僅為政策制定者提供了可靠的資訊來源，更讓離散港人獲得了參與主流政治對話的敲門磚。透過舉辦圓桌論壇、研討會，流亡港人與當地的政治精英、外交官員直接對話，這種互動模式將港人的抗爭行動，從「草根街頭」推向了「政策長廊」。這種制度化的連結，填補了本土公民社會瓦解後留下的真空，為香港民主訴求在國際制度中爭取了實質的發言空間。

C. 情感性動員與「跨國公民外交」的實踐

除了政策遊說，跨國連帶更體現在「情感性動員」上。流亡港人透過藝術展、文化節慶與在地居民進行深度交流，建立了一種基於「感性認知」的連結。以「日本香港民主連盟」為例，他們在東京街頭舉辦的遊行與文化活動，吸引了大量對政治感興趣的日本年輕人參與。這種連結不僅是政治上的盟友，更是文化上的共鳴。

這種「跨國公民外交」（Transnational

Citizen

Diplomacy

）的獨特之處，在於它不是由政府發起的，而是由基層流亡者透過網絡與在地組織編織出的細密網狀結構。這種結構具有極強的韌性：即便個別組織受到政治壓力，網絡中的其他支點依然能保持運作。離散港人藉由這種連帶，將香港的民主抗爭與世界各地（如台灣、緬甸、泰國的奶茶聯盟）的民主運動緊緊相繫，形成了一個跨國界的「反壓迫同盟」。

D. 結構性的挑戰：如何在「異地政治」中保持主體性

然而，跨國社會連帶並非一帆風順。離散者必須持續處理「主體性」與「被代表性」的複雜拉扯。在與當地主流政黨合作時，離

散者常面臨被「工具化」的風險——

即他們的議題可能成為當地政客對抗中國的籌碼，卻未必能獲得對香港民生或長遠福祉的真心關懷。

因此，成熟的離散組織必須具備高度的政治敏銳度。他們必須學會如何與不同政治光譜的組織合作，同時維持香港獨立的政策訴求。這是一場極其精細的政治平衡術：既要依附於國際社會的政治動能，又不能失去香港公民運動原本的「反抗精神」與「社會改造」理想。

小結：網絡化作為新的抗爭常態

跨國社會連帶的建立，標誌著離散港人的公民參與已進入「網絡化」階段。他們不再是單打獨鬥的個體，而是身處於一個龐大的全球民主網絡中，透過知識共享、政策協作與情感支撐，維持著香港議題在國際視野中的能見度。這種連帶機制不僅是離散後的應急方案，更可能成為未來香港公民社會重構的藍圖：一個與世界緊密連結、理性且具戰略眼光的現代公民共同體。即便流亡的地理位置遙遠，這種跨國動員的連結感，卻讓香港的民主火苗在全球各個角落，持續燃燒。

八、流亡港人的心理與身份認同

A.流亡的心理掙扎：

失根與迷惘

對許多流亡港人而言，離開不僅是空間上的移動，更是心理上的撕裂。離開熟悉的土地和文化，往往伴隨著深刻的失根感和迷惘。失根意味著與過去生活的切割，許多流亡者描述自己感受到「漂泊感」與「身份危機」。心理學研究指出，身份認同是個人心理健康與社會參與的重要基礎。流亡港人面對的心理挑戰不僅來自外在環境，更源自內在的自我認同矛盾。

B.身份認同的重構與雙重身份

在海外，流亡港人普遍展現出複雜且多層次的身份認同特徵。首先，他們往往承擔「雙重身份」：一方面是作為流亡者或移民在新的社會中努力融入；另一方面，作為政治異議者與民主運動的傳承者，他們仍堅守香港價值與政治理想。其次，透過海外港人社群的聚合，流亡者找到彼此的情感連結和支持，確認自我身份，強化政治認同。

C.文化記憶與政治認同的交織

文化記憶成為流亡港人維繫身份的重要資源。歌曲、語言、節慶、抗爭符號等，都被重新賦予意義。此外，公共教育與真相傳播亦是身份建構的重要面向，幫助流亡港人穩固自我認同，同時為未來可能的政治回歸做準備。

D.心理支持與社會參與：抵抗孤立

流亡帶來的心理壓力與孤獨感不可忽視。多個海外港人組織積極提供心理輔導與互助小組，幫助流亡者建立安全感與歸屬感。同時，流亡港人積極參與國際倡議，透過持續的公民參與回應內心的無力感。

E.面對家國的矛盾情感

流亡港人常處於兩難境地：一方面是對香港的深厚情感與責任，另一方面是與留守家人間的情感

拉扯與安全考量。此外，面對外界質疑流亡身份的合法性，流亡者必須自我辯證，這成為流亡港人心理調適的重要課題。

F.未來展望

身份認同的動態過程

流亡港人的身份認同並非固定不變，而是隨著時間、空間與行動不斷重塑。未來，流亡港人如何持續維繫與香港的聯繫，將決定這段歷史能否孕育新的公共力量。

九、記憶的守望：代際傳承與文化保存的防禦戰

在地理上的流亡之外，流亡

港人面臨著另一個更為深刻且持久的戰場——

「文化的湮滅」。隨著《國安法》對本地教育、出版與公共記憶的系統性重塑，香港的民主歷史與本土文化正遭受前所未有的「清洗」。對於散居全球的離散者而言，如何將香港的記憶傳遞給在海外成長的下一代，已不僅是個人的家教問題，更是一場關係到「香港身份」能否存續的文化防禦戰。

A.語言作為文化抵抗的前線

語言是身份

認同的載體，亦是離散

群體抵抗文化同化的最後防線。在海外，廣東

話 (Cantonese

) 已不再僅是溝通工具，而是「香港認同」的核心符號。離散港人社群自發性地推動「廣東話社區教室」與「香港文學讀書會」，不僅是為了讓下一代能用母語交流，更是在抗衡一種以標準化、強權化敘事為主的文化霸權。

透過廣東話授課的歷史工作坊，離散者嘗試將香港人的集體經驗與民主追求，植入下一代的思維模式中。他們深知，一旦母語的連結斷裂，香港獨特的公共文化與抗爭情感便會隨之淡化。因此，保存廣東話不僅是保護一種語言，更是保存一種看世界的獨特方式。

B. 「流動檔案館」的建立：記憶的去中心化

面對故土歷史被篡改、書本被下架、圖書館館藏遭撤除的政治現實，離散港人展開了一場「流動檔案館」 (Mobile Archives

) 的運動。學者、記者、藝術家與普通市民，將各類抗爭紀錄、口述歷史、影像檔案備份至雲端，或在海外建立「離散圖書館」。

這種「檔案保存」的意義在於，它將原本屬於香港本地的集體記憶，轉化為全球化的資源。透過這些數據庫，即使身處異地的港人下一代，也能通過數位足跡，接觸到那段被官方史觀刻意抹去的歷史真相。這種記憶的去中心化，使得極權政體無法再輕易通過「焚書坑儒」來壟斷歷史解釋權。這些檔案館宛如散落在全球的文化種子，等待著在未來某個時機，重新回到香港的土地上。

C.代際間的情感教育：抗爭精神的傳遞

除了知識的傳遞，代際傳承中最困難的是「精神的共鳴」。流亡者常面臨一個挑戰：如何向在異地民主國家成長的子女，解釋為什麼香港人會為了某些價值而付出慘痛代價？

這不僅涉及歷史事實的傳達，更涉及「情感教育」。離散家長透過日常對話、參與紀念活動，將對自由的執著融入生活實踐中。他們鼓勵下一代參與海外的公民運動，不只是為了香港，更是為了教導他們認識自由的脆弱性與公民責任的重量。這種精神上的接棒，將「香港人」的身份從一種血緣連結，轉化為一種「共同價值」的承諾。即便下一代可能未曾親身經歷香港的街頭運動，但透過家長與社群的情感教育，他們內化了那種不屈的抗爭意志。

D.「被記憶」與「被遺忘」的拉扯

然而，這場文化保存戰充滿了挑戰。流亡港人必須在「融入當地社會」與「保持獨特文化認同」之間尋求平衡。過度的封閉可能導致社群邊緣化，而過度的同化則可能稀釋獨特的香港意識。

此外，隨著時間流逝，離散社群必須面對一種心理上的疲憊感。如何讓下一代不因為「沈重的歷史負擔」而排斥香港認同，成為離散教育的重大課題。流亡者嘗試以更具創造力的方式，如戲劇、音樂節、新媒體藝術，來重新詮釋香港文化，使「香港身份」不僅是沈重的歷史創傷，更是具有韌性與創造力的文化價值。

小結：記憶之火的傳承

文化保存與代際傳承，是流亡港人最終極的勝利。因為只要還有人用廣東話講述那段歷史，只要還有人願意在異國土地上傳遞那份追求民主的願望，香港的靈魂便不會消亡。這場文化防禦戰或許寂靜無聲，沒有街頭的硝煙，卻深刻地決定了香港民族未來的高度。離散港人透過建立檔案、傳承語言、深化教育，將一場原本可能潰散的政治運動，昇華為持久的文化行動。這不僅是對抗極權的最後堡壘，更是香港人在全球化浪潮中，為自身身份所築起的堡壘，守候著那份在風雨中依然保持溫度的自由信仰。

十、結語：責任延續與可能未來

面對香港近年劇變的政治環境，許多港人選擇離開家園。離散絕非簡單的退縮，而是一種責任的延續，是在逆境中開創公共行動新形態的堅韌展現。

離開香港的港人，將對家鄉的情感和責任轉化為更為多元與彈性的行動形式，透過網絡與實體行動，繼續維護香港的民主理想與公民價值。離散港人的行動呈現出多樣化的樣態。教育、文化、學術研究與跨國倡議行動證明，政治生命並非局限於國家內部，而是可以透過跨境連結，擴展為全球公民參與的一部分。

過去，香港的民主抗爭很大程度上依賴於特定制度空間。然而，制度的崩潰迫使港人重新思考公共責任的本質。公共責任不再僅僅是制度內的角色扮演，更重要的是對民主、自由、人權等核心價值的持續堅守與實踐。新一代抗爭者更注重靈活性與創新性，運用數字技術與全球網絡打造新的公共空間。

離散並非放棄，亦非終點，而是承擔責任的另一種形式。無論身處何地，守護香港的自由與民主需要持續投入與創新。只要這些價值不滅，香港人的政治生命必將延續。

一個熱愛香港的香港人